

# 引子

某一共產主義政黨或國家勢力的擴張，不一定會加強蘇聯或中國對美國安全的威脅。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致  
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備忘錄  
(Henry Kissinger to Richard Nixon, October 20, 1969,  
FRUS, 1969–1976, vol. I, doc. 41)

1971年10月25日，對於會聚紐約聯合國總部的各國外交官來說是格外漫長的一天。

這一天的聯合國第26屆大會會議上，將就「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A/L.630草案及1、2號附加文件)進行正式表決。該項提案由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17國(後增為23國)在7月15日提出。根據《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大會議事規則》，這項提案通過以後，將立即成為聯合國大會的正式決議。

在10月19日至24日舉行的聯合國大會總辯論期間，七十多個國家的代表就中國代表權問題發言，各方爭論異常激烈。例如，曾有代表提交另一項提案，要求將「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列為所謂「涉及《聯合國憲章》第18條的重大問題」，並需要聯合國會員國三分之二多數贊成票方能成立。不過，在25日傍晚的表決中，這項「節外生枝」的提案遭否決，恢復新中國合法席位提案的表決因而照常進行。在正式表決前的最後一刻，時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老布什(George H. W. Bush)又聯合日本等國提出臨時動議，要求將「把蔣介石的代表從他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等內容從提案正文中刪去，造成事實上的「雙重代表案」，但同樣未獲表決通過。

反對派眼見大勢已去，已無法以任何方法阻止提案進行表決。

10月25日深夜11時15分，台灣當局的時任「外交部長」周書楷上台，正式宣讀了退出聯合國的聲明，之後便率台灣代表團退出會場。

在隨後立即進行的表決中，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通過了A/L.630草案及1、2號附加文件。該提案通過後，立即成為了正式決議，即《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全文如下：

大會回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考慮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對於維護《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組織根據《憲章》所必須從事的事業都是必不可少的，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他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他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自新中國成立已悄然過去了2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在聯合國唯一合法代表的席位終於在此刻得以恢復。對台灣當局來說，則如同是第一塊多米諾骨牌的轟然倒下，一連串重大的政治打擊勢必接踵而來。此後數年間，新中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陸續建交，亦只不過是時間問題。雖然美國在此次表決前，似有努力阻止聯合國接納新中國，但台灣當局對美國人的真實態度卻早已心知肚明。之前，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基辛格就曾直截了當告誡台灣當局——只有放棄聯合國安理會席位，美方才會考慮助其一臂之力而提出「雙重代表案」。<sup>2</sup>

結果毫不意外，白宮並未全力以赴，甚至是默許北京獲得聯合國安理會之席位。

自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宮後，便一直熱衷於發展與北京的正常關係。在恢復新中國聯合國合法權利議案提出前後，尼克松就以一種近乎默契的方式對外宣布將於1972年5月前擇機訪問中國大陸，而基辛格則已於7月11日秘密訪華後返美。台灣當局得知後，立即向美方提出抗議，言辭激烈地表示：「此舉將使我維護代表權的努力遭受重大損害。」<sup>3</sup>然而，美國方面卻依舊不為所動，繼續堅持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在10月4日聯合國大會總辯論期間，



圖 0.1 周書楷 (1913–1992)

周書楷，湖北安陸人，國立中央大學畢業後，於1938年加入中華民國外交部。抗戰期間，長期派駐英國。1945年返國後，曾擔任過美國特使馬歇爾 (George Marshall) 的翻譯。1949年隨國民黨政權遷台。1965年被台灣當局任命為駐美「大使」，任內曾促成蔣經國訪美。1971至1972年，短暫擔任過台灣當局「外交部長」。之後，又曾轉任駐荷蒂岡「大使」。

時任美國國務卿羅傑斯 (William Rogers) 發言指出：美國認為不應將世界一大部分人民及重要勢力長久拒於聯合國之外，使其處於孤立狀態，因此尼克松總統在兩年前就試圖改變美國對華政策，尋求改善與中國關係的辦法，以期外交正常化。有鑑於此，尼克松才決定接受訪華邀請，也因此決定支持新中國進入聯合國，並取代台灣當局獲得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席位。

10月5日，美國白宮宣布基辛格將在近期再度訪問北京。台灣當局的代表得知後，緊急約見羅傑斯要求澄清，認為此時出訪，勢必有損台灣當局維持聯合國席位的努力，甚至抱怨尼克松根本無意提供切實協助。事後，羅傑斯向尼克松轉告了台灣當局的不滿，尼克松則輕描淡寫地表示「這不過是一個能見度的問題」，並認為北京方面離他們期待的目標已經非常近了。<sup>4</sup>至於老布什在10月25日表決前最後一刻拋出的臨時動議，亦不過是敷衍台灣當局的象徵舉動而已。

10月29日，台灣當局被逐出聯合國後第四天，風塵僕僕的基辛格剛從北京歸來，在白宮接見了周書楷。不知是公務繁忙還是有意為之，基辛格讓客人在辦公室門外苦等了半個小時。雙方見面寒暄後，基辛格便刻意提高嗓門，用「三字經」問候老布什，指責他辦事不力，理應將投票拖到他回國後再進行。接著，他又煞有介事地轉達給周書楷，指尼克松總統對表決結果感到痛心與歉意：「此中關鍵現今反省，實在是我沒有介入實際戰術的運用」，並稱台灣當局被逐出聯合國「實在是我及美國政府最不願發生的事」。<sup>5</sup> 剛剛還被晾在辦公室外苦等的周書楷，顯然對這種「廉價同情」並不買帳。他堅決要求美方以公開聲明的方式來繼續支持國民黨政權，藉此來安定島內動蕩不安的人心，但基辛格顧左右而言他，不願正面回應。之後，白宮的全部精力幾乎都放在尼克松訪華的安排，根本無暇顧及台灣方面的感受與憂慮。

僅僅四個月後，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如約正式訪問中國。他先後造訪了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其間，中美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即著名的《上海公報》）。美國在公報中首次公開宣示：美方認識到（acknowledge）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並對這一立場不表異議（not to challenge）。美方重申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並將逐步減少在台美軍設施和武裝力量。<sup>6</sup> 尼克松回到華盛頓後，在國會演講中得意地表示，過去一週是「改變世界的一週」。雖然在演講中，尼克松也提到會繼續尊重與台灣當局既有的共同防禦條約，但台灣方面的恐懼、憂慮及失望的情緒仍不可避免地加劇著。

1972年3月1日至2日，台灣當局的時任駐美「大使」沈劍虹先後拜訪了基辛格及羅傑斯，希望白宮能夠澄清與北京之間究竟

是如何商量處理台灣問題的，得到的答覆是「美國與中共之間沒有暗盤交易」。<sup>7</sup>對於這種看似言之鑿鑿的說法，來自台北的官僚們自然不再輕易信任，皆持懷疑態度，更有直接用激進言語表達「悲憤」之情者。3月8日，周書楷在接受美國赫斯特報團(Hearst Communications)記者採訪時就情緒激動地公開宣稱，「美國如此待我們，使我們只有發展與蘇俄的關係」。實際上，這已不是周書楷首次發表類似言論，此前他至少先後兩次公開闡述此類觀點，甚至曾這樣講過：「為了國家利益，如果『魔鬼』能幫助我，我們也要和『魔鬼』握手。」<sup>8</sup>此言論一出，輿論自然一片嘩然。

原蔣介石的私人英文秘書、時任台灣當局「外交部北美司司長」錢復，<sup>9</sup>曾私下提醒周書楷這類的言論可能有欠妥當。未料，周書楷毫不為意：「這點你不太明白。」<sup>10</sup>雖然錢復曾是蔣介石英文翻譯的「舌人」，但他當時畢竟只是中層官員，確實未必明白周書楷這些話背後的意涵。周書楷對外國媒體的公開發言，看似是情緒激動之下的埋怨，實則其來有自。實際上，蔣經國多年前就曾講過類似的話：「要知今天不是講道義的時代，而是『不是敵死，就是我死』的世界」，並直言「必須注重現實」。<sup>11</sup>

早在1960年代末，台灣當局確實與蘇聯進行了多次秘密接觸。雙方通過秘密特使等方式，彼此交換了大量情報，並就合作事宜進行過實際磋商。雙方接觸時，甚至談及結成同盟、共同反對「毛澤東政權」的話題。這對看似異想天開的「不可能的盟友」，置於當時冷戰的格局中，倒有其合理性。

眾所周知，台灣海峽是冷戰的最前線之一。

1949年新中國成立，國民黨政權退居台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共內戰只不過是按下「暫停鍵」，猶如「電影的停格，圍棋的

長考」。<sup>12</sup> 國共雙方自然在思考下一步怎麼走，而台灣海峽鐵幕遠方的美國、蘇聯同樣在考慮台灣海峽在他們各自大戰略中的布局位置。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正是二戰後整個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美蘇對峙的冷戰態勢進入僵持階段，而中蘇之間卻出現了嚴重分裂，其分裂甚至逐步公開化。與之相對，美國與新中國的關係則出現解凍的跡象。在中美關係日趨緩和的背景之下，台灣當局與蘇聯基於各自安全利益的考慮，同樣嘗試進行了一場看似不可能的接觸。莫斯科方面希望將所謂「蘇台關係」變成向北京施加政治壓力的新籌碼，繼而影響美國在遠東的戰略布局。另一方面，台灣當局在美國支援「反攻大陸」無望的情況下，轉而探尋與鐵幕另一邊的蘇聯合作的可能性，組成跨越意識形態陣營的「反毛同盟」——這似乎也不再是天方夜譚的幻想了。

於是，在美蘇冷戰格局日趨穩定、中蘇之間嚴重分裂、美國亦拒絕支持台灣當局「反攻大陸」計劃的複雜政治背景下，莫斯科與台北的第一次涉及實質內容的接觸，就這麼悄然開始了。

雙方這段秘密交往，要從1968年10月22日一位蘇聯記者造訪台灣的奇妙經歷慢慢說起。

## 註釋

- 1 《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六屆會議·大會決議·二七五八(二十六)·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A/RES/2758(XXVI)，1971年10月25日，<http://www.un.org/chinese/ga/ares2758.html>。
- 2 錢復，《錢復回憶錄》(天下遠見出版有限公司，2005)，第1卷，頁150。
- 3 同上註，頁149-150。

- 4 Conversation 011-105, October 17, 1971, White House Tapes,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https://www.nixonlibrary.gov/white-house-tapes/011/conversation-011-105>.
- 5 錢復，《錢復回憶錄》，第1卷，頁163–164。
- 6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1978年12月16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zmlhgb/202206/t20220606\\_10699039.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zmlhgb/202206/t20220606_10699039.shtml) (2026年3月23日訪問)。
- 7 錢復，《錢復回憶錄》，第1卷，頁187–188。
- 8 同上註，頁191。
- 9 錢復，1935年出生。1962年在美國耶魯大學獲博士學位後返台，在台灣當局「外交部」工作，並在其間擔任蔣介石的英文翻譯員。1972年任「新聞局」局長，後曾任台灣當局駐美代表。1990年任「外交部長」。1999年任「監察院」院長，任內曾主持「三一九槍擊事件」調查委員會主席。在台灣政界，錢復曾與陳履安（陳誠之子）、連戰（連震東之子）、沈君山（沈宗翰之子）並稱為「政壇四公子」，其父錢思亮曾任台灣大學校長、台北中研院院長。
- 10 錢復，《錢復回憶錄》，第1卷，頁191–192。
- 11 〈1964年4月7日〉，蔣經國著，歐素瑛等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1964》（台北「國史館」，2024），頁132。
- 12 此比喻出自王鼎均，〈冷戰時期的心理疲倦〉，《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頁232。

# 克格勃到台灣

## 第一章

「國民政府」在採取行動前，美國與台灣方面須先進行協商，因為進攻大陸會把美國捲進去，所以要把美國政府的看法向「國民政府」進行說明。

—— 1963年5月22日，肯尼迪(John Kennedy)總統在  
記者招待會上的發言  
(“News Conference 56,” May 22, 1963,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惟有自今日始，對美絕望，決另起爐灶。

——《蔣介石日記》，1968年10月20日